

## ■新作聚焦

## 津子围长篇小说《大辽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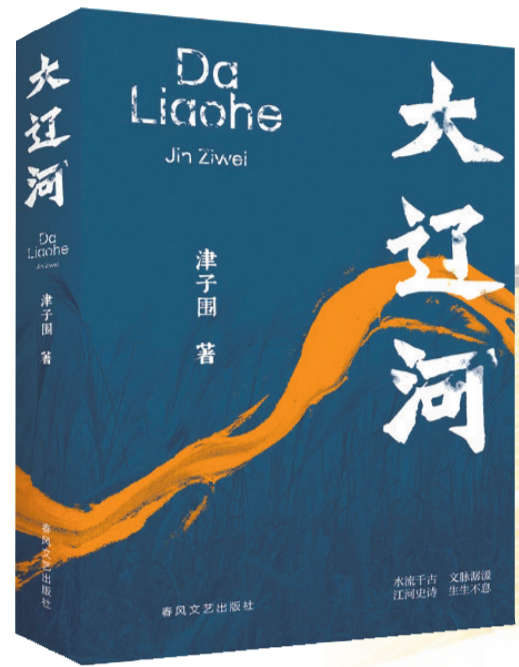
## 河流的精神重生与美学发现

□周荣

长篇小说《大辽河》获得第十七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为写作此书，作家津子围花了差不多三年的时间“走辽河”，从辽西河的源头老哈河、西拉木伦河到东辽河的源头，再到盘锦和营口的入海口。吃过的饭、住过的店、遇见的人，比辽河水更斑斓；途经的城镇村庄，走过的古道长亭，目睹的风物人情，在泱泱长河折射的光晕中幻化为流动的历史。于是，行走的作家、滔滔的辽河，一时一地的思绪，打包成“非虚构”的叙事形态——本质上也是虚构——进入到《大辽河》中，以第一人称“我”的视角，讲述着辽河流域曲折而漫长的文明史，占据了重新发现并命名一条古老河流的有利地形。而小说“虚构”的那一部分则交给了身处不同年代、彼此关联并不紧密的一群人，其中有烧炭工二哥和儿子三哥两代人的爱恨情仇，有被骗去闯关东竟歪打正着落地生根的表叔一家，还有蒙冤发配到东北的流人四叔的传奇人生，以及一辈子吵吵闹闹的三姐三姐夫、打打杀杀的二姨二姨夫、风风火火的堂妹……把这些不同年代的人和故事连缀起来的是一枚龙凤玉佩。毋庸置疑，《大辽河》是一次对虚构千古、包举宏纤的写作信念的实践，“千古”之“宏”留给了烟波浩渺的辽河，在东西之水将王朝交替、社会变迁与文明兴衰一网打尽；生活之“纤”交由时代中具体而鲜活的个体演绎，那些无以言表的唏嘘与悲欢，构成了无数个日夜的底色和芯子。那个行走在辽河边极目眺望、思绪飞扬的津子围既是全知全能的叙事者，转身又潜入文本，作为叙事的一部分，“非虚构”中的一员，参与文本的建构，而从大历史的视角看，他又何尝不是自己虚构的故事中的四叔或二哥呢？当小说模糊了虚构与非虚构的界限、文本内外的界限，上世纪80年代先锋文学的光晕再次降临，在与当下文学叙事新质的碰撞中建构起新的形式美学。某种意义上，不是津子围设计了虚构与非虚构并置的文本结构，而是辽河选择了这样的文本形式，在虚构与非虚构的相互交叉、彼此观照中，辽河的神韵在文学叙事中获得美学赋形。

《大辽河》独特的叙事结构和故事形态决定了小说没有贯穿始终的人物和故事线，每章相对独立，每个故事各说各话，贯穿小说始终，也是串联起章节故事的两个“主角”，一个是辽河，一个是龙凤玉佩。前者是自然性的，是人类繁衍生存的必备物质条件之一；后者是社会性的，是中华文明发展进步的标识，两者共同指向天地玄黄、宇宙洪荒的极限，又回到生生不息、绵延不绝的人世间。基于辽河与玉佩的隐喻性，《大辽河》建构了一个空间与时间的坐标系，小说中的人物与故事散布在这个坐标系中。因为稳定的坐标系的定位与支撑，看似松散的每个人有了人类学意义上的接续，每个故事有了文化意义上的传承。因此，《大辽河》既是一次地理志式的具象写作，也是对自然与文明的超越性思索。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在文化源头上塑造了河流与时间之间紧密的联想感知。《大辽河》打破了这种文化惯性，小说中的辽河更多地呈现为一种苍茫而辽阔的空间感，重新定义了河流美学与大地伦理的形式感。《大辽河》主体章节故事的弱关联性冲淡了长篇小说整体性把握历史的文体特质，而所谓的“非虚构”部分则“化实为虚”，由“我”对辽河流域人文地理的考察、“我”与晋先生的交谈对话，发散到对茫茫世界、浩瀚宇宙、普遍的人类历史与生存的思辨性认识，承担起长篇小说的容量、深度和厚重感。“走辽河”丈量的地理实感与思辨性认识打开的精神空间构成了关于辽河的空间表征。津子围说过：“五六千年前的西辽河并没有那么多荒漠，牛河梁遗址和查海遗址考古中都发现了核桃残骸，说明那里曾是阔叶林带，水草丰美，孢子粉检测也证实了这一点。后来生态环境被破坏，尤其是辽金时期，辽河上游趋于荒漠化……《大辽河》写了两个被淹没的古



《大辽河》，津子围著，春风文艺出版社，2023年12月

《大辽河》是一次对虚构千古、包举宏纤的写作信念的实践，“千古”之“宏”留给了烟波浩渺的辽河，在东西之水将王朝交替与文明兴衰一网打尽；生活之“纤”交由时代中具体而鲜活的个体演绎，那些无以言表的唏嘘与悲欢，构成了无数个日夜的底色和芯子

龙凤玉佩所隐喻的文明，练就的是太极内功，扮演了既表征时间又克服时间的角色。器物永续、文明传承，本身就是时间的力量；而文明又是人类克服生命的有限、超越自我、不断前行的绝对动力。

从体量和比例上看，虚构部分是《大辽河》的主线，非虚构部分是小说的副线；但从叙事意图和效果上看，每一章中虚构的故事是非虚构的衍生品。每一章的故事都是“我”行走辽河某一段落后的想象之物，填充起非虚构中的细节“空白”。于是，“我”从非虚构中的“行走者”变成虚构中的“讲故事的人”。在本雅明看来，“讲故事是最古老的传播方式”，在席勒所言的“朴素的诗”的时代，讲故事的人通过不断的复述，呈现出自己所理解的世界。“讲故事是把故事融入讲故事人的生活之中，从而把故事当作经验传递给听故事的人。”讲述的故事既代表了讲述者的时代想象，也满足了接受者的心理期待，从而构成一种叙事共同体，共同承载一个群体的情绪与记忆。

因此，无论是老舅与东家之间有情有义、知恩图报的故事，还是三哥与芥菜疙瘩之恩将仇报、四叔受学生牵连蒙受不白之冤、抑或四表哥为爱情与师傅决裂出走的故事，一方面，在集体接力的传承中，普通人的世俗经验与道德隐喻被有效地固定下来，普通人的故事被赋予本雅明意义上的“光晕”，进入历史叙事；另一方面，普通人也获得了讲故事的权力，带领听故事的人和读者一起，塑造历史，也重申自身。《大辽河》在虚构与非虚构之间塑造着人们关于辽河的记忆与想象，为读者提供了在虚实之间参差对照、想象一条河流的空间和可能。

(作者系东北大学艺术学院教授)

## ■创作谈

《大辽河》写作之前，我用三年时间“走辽河”，最初的想法比较简单，觉得一名写作者，只能通过文字来回报养育自己的母亲河，当然，这其中也隐含着某些“功利”的念头，希望这本书能给我带来实际的利好。然而，随着对辽河探访的深入，我越来越感受到自己的无知和渺小，在无垠的时间和空间里，自己不过是一粒细微的尘埃，内心产生了无比的敬畏，并对自己的功利想法感到羞愧。写完小说的一个早晨，洗漱中的我突然意识到：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条河流。

如果把一条河看成生命的过程，那么，源头是出生地，上游则是童年时光，激越跳荡，然后进入青春期，充满活力。河流的中游是它的中年，滋养深阔。下游进入老年，宽大宁静，对其承载的恩泽都看轻看淡了。一条河流就是一部人类文明史。“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次将辽河提到了中华文明起源的高度，红山文化就是确证。红山文化遗存的赵宝沟、兴隆洼、查海到牛河梁遗址，从距今8000多年前延续到距今5300年前。辽河流域生活着肃慎、秽貊和东胡三个古老族系，也是游牧、渔猎、农耕三种文明交汇区域，早在7000多年前查海遗址古人DNA检测，就发现中原的O2基因，不同的文化交流、碰撞，催生了古代文明的起源与形成，一直影响着中国乃至东北亚历史的发展。

每个人都是一条河流。虽然，我们站在当下时空交错的坐标点上，而从分子人类学的角度来说，我们每个人体内都有O/C/N/R的成分，都有人类成长过程中所有的基因片段，那些片段就是历史的细胞，如一条河流一样流淌在我们身体里，那么，可不可以这样说，我们每个人的身体就是一部完整的人类史。

从文学表达的角度来说，河流不仅是一个地理上的概念。这也是一条精神上的河流，是弥合文化断裂叙事缺口的精神还乡，以期完成精神价值的现实置换。河流不仅是自然生态之河，更是“故事中的河”和“人的故事”，交汇着客观的现实和想象的现实，如同平行时空中的个体。这个平行时空镶嵌在每个历史时段，触碰到量子纠缠，由“我”变成了“我们”。河流也不仅是地域的文化符号和卷帙索引，它同样是解锁古老文明的一串密码，沿着它重回历史去打捞传统文明，寻找古老智慧，感受到人类文明的精神共性与艺术形象的宏阔伟岸。

《大辽河》的写作过程仿佛一场文明考古，如同面对忒修斯之船，当辽河历史的船板被一块块更换，忒修斯究竟是船还是一点点换下来的船板？也许，剩下才是文明基因的秘密。

写一条河流就不能离开它的历史，历史记录的大多是帝王将相和才子佳人，很难找到平民的影子，对于东北来说，除了帝王将相，甚至连才子佳人都少见。由于“平民”史料缺乏，对历史上百姓的书写需要下很多苦功夫和笨功夫。这部小说中的人物，都是辽河两岸的普通百姓，烧炭工、制玉人、车夫、商贩、流放犯人、柳编蒲编工匠、水利技术员等，主人公没有姓名，都是亲属的称谓。《大辽河》试图通过为普通人立传，为平民百姓奉献出有深沉情感和温度的诚意之作。事实上，用一部小说完成对一条河流的书写是有难度的，因为一条河是不能被简单定义的，或者说，传统的小说叙事方式难以对一条河流进行准确的描述和表达。《大辽河》运用了跨时空和跨文体写作的方法，既有虚构也有非虚构，涉及到文物考古、民俗学、非遗传承，甚至植物学、水文学地质学、分子人类学等，我觉得只有这样相对“恰切”的创新，才可能接近河流的自然形态。

在世界文化激荡和科技剧变的环境下，作家的影响力或许越来越小了，但仍需要用“炽热情怀”来坚守，让我们自己这条河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洪流汇聚起来，命运与共，息息相关：“好将一点红炉雪，散作人间照夜灯。”

(作者系辽宁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 每个人都是一条河流

□津子围

## ■短评

## ■新作快评

## 杜梨中篇小说《鹃滴》，《收获》2024年第4期

杜梨的中篇小说《鹃滴》有着绮丽梦幻的超现实外观。主人公花末拥有构梦的天赋，每当入睡便会进入一座梦中的城市。其中风物奇崛殊胜，时空无穷无尽，给予她在逼仄现实中难以获得的安全与自由。这一设定使人联想到另一位“90后”作家陈春成的《夜晚的潜水艇》。其主人公与花末有着相似的“异能”，凭借超常的想象力在头脑中拟构出一方桃花源般的幻境，一到夜晚便进入这一幻想世界，驾驶一艘潜水艇遨游于世界各地的瑰丽深海。同样是幻想与现实的对照，《夜晚的潜水艇》所隐喻的是庸常与超凡。“高考、就业、结婚、买房”，按部就班的生活轨迹压抑了主人公的奇思妙想，使他由天才泯然众人。但在《鹃滴》中，所谓的“凡俗人生”恰恰成为了求而不得的愿景。花末与丈夫多荷果渴望的只是在庞大的城市寻找一处容身之所，为即将出世的孩子提供一方安全安稳的巢穴，“普通地过上平静的生活”。然而，各种各样的阻碍却令这位因孕育新生命而更加敏锐警觉的女性感到危机四伏、疑虑重重。

迫于北京的高房价，花末夫妇一直没有购房，因租房而陷于“随时准备卷铺盖走人”窘境。他们每次搬家，“都感觉肉被啃掉，灵魂流出，小壳也破了”。又得花两三个月，才能一点点复生”。花末怀孕后，多荷果决心买房，他将目光投向出售困难价格较低的“凶宅”，由此被动地卷入一系列案件之中。文中多次描写花末夫妇维系的小共同体形态：“这是她在两人小小的茧里想出来的情景。他们的生活是一枚茧……”由于长期伏案工作，多荷果的背越来越驼，更像只蜗牛了……她真怕有人踩碎他小小的壳。”“他俩就像一枚花生，把壳掰开，里面盛着一只小小的生果仁。多荷果每日小心浮在水上，生怕花生翻了。”“凶宅”的前任女主人杜鹃生前发现的空间

## 去真实的生活中的磋磨

□李琦

裂隙，正是这种焦灼不安的生存状态的恰切隐喻。在生计负担与生存现实的挤压中，他们竭尽所能试图寻找一道可供片刻喘息的缝隙。主人公花末的逃遁之地是梦境与自然。她喜爱并且熟悉各种小动物，在对“家”的渴望与焦虑之中，她参照中华攀雀的“芒果巢”，在梦中为未来的孩子建造房屋。小说中，无论是梦境还是自然，都并非隔绝于现实的世外桃源。故事结尾，杜鹃以她生前被压抑的智慧帮助花末走出了空间裂隙，而花末也将杜鹃的身体带到了当下时空，使悬案得以澄清。这一情节的启示在于，个体应当做的不是瑟缩于蜗壳之中，“不介入他人的因果”，而是与其他弱者相互看见、努力连接。这不仅限于人与人之间，也包括其他生物。小说多次写到动物的眼睛，雪鸭、海雕、花牛、流浪猫……在物理学家刘左峰眼中，他只能看到实验所需的“琥珀色亮斑”，而花末、杜鹃、多荷果却在与这些赤裸纯真的眼眸的对望中体认到一种责任感。在花末的梦境也即她的理想世界中，动物与人相互幻化，万千造物声息相通，她可以透过鸟类的眼睛看到爱人。

小说的开头与结尾一再表明，这并非一篇造梦之作，编织梦境正是为了冲破与毁灭。主人公与作者均已觉知，梦无论如何美妙，都有种“杜鹃寄生的不真实感”，“必须醒来，去真实的生活中的磋磨”。真正带来改变的，并非造梦的天赋，而是超越一己、感应他者的能力，是意识到“我们与这个星球脉络相连”，各种生命在同一片磁场中息息相关，牵一发而动全身——如“鹃滴”这一题目的暗示。只有这样，人类才可能像主人公梦中那片动人心魄的鸟浪一般，虽然每只都脆弱渺小，却终能借助彼此的力量抵御风暴、飞渡彼岸。

(作者系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

## “江南是我永远的原乡”

——读张建安诗集《江南物语》

□夏惠慧



《江南物语》张建安著，江西高校出版社，2024年6月

张建安的理论文章大多浸润着一种传统文人的敏锐观察和深刻思考，弥漫着一种浓郁、诚挚的诗性情怀。最近出版的诗集《江南物语》是他几十年来诗歌实践的结晶，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诗集选录了作者创作的69首诗歌，分“序章”“江南意象”“江南情绪”“江南记忆”“江南怀念”“江南叙事”和“尾章”七个部分，颇显古朴厚重，这些精美的诗章集中表达了他对故乡的深情思念、对人生的深刻感悟和对社会的敏锐思考。

在“江南意象”中，我们跟随诗人浪漫的追忆，回顾了江南地区从早期被视为“蛮荒之地”到逐渐成为经济文化中心的历史进程。这里的“江南”，既是古人诗中的世外桃源，也是根植于中华民族共同记忆中的文化源泉。随后二、三两辑，写“江南情绪”和“江南记忆”，在诗人细腻的笔触中，我们感受到浓郁的江南古韵，不仅在源于源远流长的人文风姿，也在子钟灵毓秀的自然风光。古往今来，江南的桨声灯影里永远萦绕中国人最浪漫的想象、最缱绻的情思、最深厚的乡愁。张建安既从历史的车辙里探寻江南的风雨人事，也从自身成长的记忆中描摹江南，那是中国人文化血脉中不可磨灭的桃源水乡，也是几十年来魂牵梦绕的故乡净土。

人生轨迹的变迁，带来诗人观察视角的调整——时空上，他离故乡愈来愈

远了；但情感上，他又离故乡越来越近了。这种看似“错位”的视角使得“江南”的形象更富层次、更显深邃。特别是诗集的第四辑和第五辑，伴随“江南怀念”而来的，不仅是回望过往、抚今追昔的深深感慨；还有“江南叙事”中聚焦热点、反映当下的时代使命感和社会责任。随着年岁渐长，他更喜欢抒写童年和少年的记忆，抒写“让人欲罢不能而又愁肠百结的乡愁”。在他看来，乡愁是我们心底最坚硬而又最柔软、最厚重而又最缱绻的情感，由此生发出令人感动的文学情思。他对故土的深情厚谊，在《江南物

语》中表现为无数个“我”和“你”在诗情画意中邂逅，如“像遥远的海岸等待倦航的归来/我是山，等待着您迟到的依偎”“你我将不偏不倚的期冀/阅读成轻轻的招手、默默的倾诉”等。对故土离魂的乡恋与心忧天下的情怀杂糅在一起，他的诗中既有家中高堂的笑容笑颜，也有国中高士的无限荣光，“家”和“国”也在诗意世界中融合统一。

近年来，张建安深入生活、全面体察从精准扶贫到乡村振兴的伟大历程，写下了《驻村书记》《驻村主任》《山村变了样》《走出大山》《乡长咏叹》等一系列与中国式现代化同频共振的新时代新诗篇。他笔下既有投身乡村振兴、忘我牺牲的村干部，也有淳朴善良的山里人家，更有新时代旧貌换新颜的社会主义新农村。这一系列聚焦江南一隅，投射中国乡村的优秀诗篇，是张建安从属于自我的诗歌王国中重新出发，以更接近本质、更贴近泥土、更亲近人民的方式，对新时代江南基层和广大建设者的深情礼赞。

正如他在诗集尾章中所写的：“江南是我永远的原乡/是我郁郁葱葱的桑梓地/也是我永远不干涸的文艺源泉/她滋养了我/给予我无限的温暖/和不竭的灵感……”这片土地蕴含着民族由古至今的文明密码，同时也植根着他投身艺术的不悔初心。

(作者系湖南艺术教育研究所讲师)